

張茂桂，〈SSCI 與學術「認可」的問題〉，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5卷第1期，(2003.6)，頁5-11。

定SS

用簡單的量化指標，無法正確地區分或評斷學術成果的好壞，更好的作法是對學術研究的成果作非常精細的質量評鑑。譬如說，我們同樣有一份學術研究，我們與其看這個人的vita上面的publication index，倒不如找幾個人來，很仔細地讀他所有的作品，從數量到品質上都能做一個更深入的評鑑。這當然是非常好，但我要說，這是非常理想的作法。但今天在整個學術界，不管從升等、續聘、到國科會各種執行的制度之下，這種理想性的作法，最多只能成爲理想，在現實性上是不可行的。我們很難想像每一份、每一個人的學術成果都要動員龐大的人力和物力，來進行評鑑，這是一個簡單的成本效益問題。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我現在在經濟學界，我認識的一些經濟學界在國外學校，美國一些top學校的人，他們從來不費事去找其他學校的人去employ他們的新faculty，我曾問過他們類似的問題，難道你們認爲只有Top 10的學校才是最好的嗎？只有那邊的人適任到你們學校來教書嗎？我們當然相信別的學校也會有人寫出很好的博士論文，也適合到我們學校來教書，但我們沒有辦法花那麼大的資本去搜尋這樣子的人。所以我們相信會有遺珠之憾，但這也是成本效益的問題。他只願意在他已知的成本之內，去找最適合他們的人。所以對

它做一個標準，好過沒有標準。用SSCI的確沒有辦法看到一些品質的部分，但是站在執行的層面上，有時你得到一些方便，也要付出一些代價。這是我的看法。

最後我想談一談對學術國際化和學術進步的看法。我認爲走向國際化的確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發展我們自己的學術，有絕對的正面作用。我也一向認爲，台灣很小，可是我們的心胸和視野不必很小。而學術研究的世界很大，我們即使全力以赴，都未必能看到學術全部的面貌，也未必能探討到學術精微的地方，所以我認爲學術國際化或是不是需要國際化，如果是校節的部分，也許都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重點。

■ 論壇：學術「國際化」的得與失

一、論壇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 張茂桂

SSCI與學術的「認可」問題



我想最近常看到一些關於SSCI的討論，其中有些相關論述與表達，讓人擔憂將改變台灣的知識生產方式以及知識生產課題，促發想要知道SSCI到底是怎麼做成的。避免我們在弄不清楚SSCI到底代表什麼，就一味的追求，或者用以代表有「認可」的學術成果。

和這相關的問題，是建立學術社群以及評鑑的問題，而對於SSCI的莫名看重，直接涉及到長久以來所謂學術社群「國際化和本土化」的辯論問題。鼓勵向SSCI蒐集的刊物投稿，代表一種國際化、參與國際學術競爭的成就。我其實

在稍早時，在比較屬於社會學的觀點裡就會提過，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對立，其實是一個策略性的問題，不是實質的問題，如果真要深入看，其實所有傑出的社會學，除非是跨國比較研究，幾乎都是從「本土」社會學出發。而所謂國際的社會學，大部分時候，也就是用英文、法文寫的社會學，也是關於英美或者法國、歐洲的「本土社會學」。如果從社會學到中國以及台灣的歷史過程來看，事實上，經濟學和政治學也差不多，都和國家民族所面臨的現代化或西化浪潮脫離不了關係。所以我們早就在朝向國際化（以西化爲代表）的途中，只是我們現在談的國際化策略跟十九到二十世紀初期時是不一樣的。當時我們借用社會學或經濟學看自己社會的問題時，是把它（們）當成有效的科學工具，來作自我社會的體檢、甚至藉勢進行自我改造的工程。我一直認爲我們應該把知識生產過程當作脈絡化去看，不要當作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對立，而是知識生產的策略運用問題。現在談的國際化，英語化，是策略性的一種轉變。

我還記得1970年代初期我們在台灣大學社會系唸書時，我們大二的英語教學的課本就是社會學，所以社會學是和英文一起學的，一邊學英文、一邊念社會學。我們當時就認為，社會學就是應該要這樣，一定要向西方學習、甚至用英語去討論自己的想法。其實，社會學裡面使用的英文，往往是蹩腳的、非文學的幽雅英文。而用讀英文的方式來讀社會學，又會去弄文法、片語而疏漏真正的重點。

在這樣的氣氛下，當時我們都已經有了一個懷疑，大部分的同學直到大學四年畢了業，還是不瞭解社會學到底是在研究什麼。因為我們的教科書全都是「關於」歐美社會的知識，我們沒有那個文化背景以及基本關心，不懂得別人的提問對象，甚至無法理解他們的基本出發點。比如我們常提到，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大家都知道這是重要的經典，社會學理論幾乎一定會提到，學生也都一定要研讀，但是台灣人讀了老半天，可能根本不知道基督新教倫理的真實社會是什麼？除非我們真的有機會去接觸到那個西方的基督新教的社會，或者在台灣非要是長老教徒，才真的有可能瞭解，也才知道基督新教裡這些東西和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所以有相當大的隔絕。反過來說，當時我們如果有人寫關於「媽祖崇拜和中小企

業精神」，或者這一類的「本土課題」，大家一定會更容易瞭解。

事實上，1970年開始，台灣的社會科學界，有一個重要的學術典範的建立工程，這個工程簡稱為「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趨勢，這個本土化的趨勢其實就是對於我剛剛所說的那種對於西方的距離的反省。就是當在研究自己社會的時候，學者發現有障礙，不能一味地以研究別人的理論和研究途徑來瞭解自己的社會。這個社會學的本土化當時叫做「中國化」，中國人的性格的研究、中國人的現代性的研究當時領導的那些人都還在，比如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幾位先生，年輕一點的如葉啟政、高承恕，他們都是有很深刻的反省性。你說他們不國際化嗎？其實不是，他們其實有很多國際性的資歷。但他們有一個研究的策略和關懷，就是說，我要如何去瞭解我們的社會。這裡面「文化特殊性」是一個重要問題、語言也是問題，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提問題的方式會不一樣。如果你不這樣子去追求知識，沒有反省力的話，永遠只是在套用別人的關心，別人的理論，複製一些「區域」研究而已。

談到這邊，最近聽到高承恕教授講到他自己的一個故事。高承恕教授對我們年輕人的影響力很大，他是台灣最早創

造了韋伯熱、也是台灣最早創造布勞岱研究熱的社會學者，但是現在他在研究台灣的股票市場，把股票市場當成一種經濟行為、社會的集體參與、操縱以及權力支配關係。他這個轉變是從哪裡來的呢？根據他自己的說法，好像是在1987年時，他原本都在高談闊論社會學的理論、流行思潮，而台灣正好發生「十信」風暴，國民黨立委蔡辰洲經營的信用合作社被掏空，當時先得到風聲的大戶包括官員家屬在內，都在事發前把錢提走了，造成雪上加霜的資金壓力，而散戶小老百姓的存款則全都被倒帳，它們四處陳情抗議，而這在戒嚴時期，直接挑戰不能集會遊行的規定，鬧成社會很大的風波。當時有一位做歷史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學者Gary Hamilton（現在是華盛頓大學社會系教授），正好在東海大學訪問。Hamilton問高承恕，這個十信風暴是怎麼一回事，也就是台灣的政經關係問題，金權政治問題，高教授自己形容當場傻眼在那裡說不出來。當人家在問台灣社會大的relevant issues時，做為一個弄大理論的社會學家，高承恕感慨自己居然一句話都沒得提供，進而就改弦易轍、開始做所謂的經驗研究，就帶著他的學生去做中小企業發展、地方派系與金權政治的發展的研究。

這個例子是說，我們不能永遠停留在

複製、翻譯一些理論和概念，必須真正去面對你的社會，去思考你的社會的議題，建立研究的relevance，這就是一種反省性，我們姑且稱之為本土化，這不是用來和國際化對立的。而是說，對於一昧地西化，或者，只是過去一些偏頗的研究取向想法的積極反省。

其次，我要來談談SSCI。我剛剛有談到為什麼這會讓我感覺到有一些困惑以及擔憂的問題。最近這幾年可以看到有一些學者，開始在自己的履歷和出版品後面加上這是SSCI的字眼，你在網頁上也會看到有加上括弧。意思是說這是被「認可」的，等於說是一種正字標記，告訴大家有一種識別作用。碰到比如說，在Issues and Studies出版的同事，他會進一步註明：這是「台灣唯一被SSCI承認」的刊物，其實Issues and Studies的確是被蒐集進去，但是把它說這是「承認」，我們就要進一步問，為什麼是「承認」與「不承認」的問題？難道說，Issues and Studies是台灣學術成就被承認的刊物嗎？我想即使Issues and Studies的編者，也不會這樣宣稱。既然不是，那麼，這應該是SSCI蒐集者的問題，而不是台灣學術成果的問題。

過去對我來說，SSCI所提供的資料庫，就是一個很好的蒐集文獻的地方，如果在上面找不到，我就得很麻煩地要

到圖書館去找，去搜尋紙本。我不清楚什麼時候SSCI從一個資料庫變成一個正字標記，這個問題我覺得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很明顯地，這對我們學術研究有幾個影響，一個是學術單位考評內部的標的，爲了評比要實用，要看有沒有好的出版品，在好的學術期刊上出版，但是一般學術領導人在面對各種不同專業與領域的評比時，常無法進行實質評比，所以就拿SSCI來，當作一個門檻。第二個就是，它不只是內部評鑑，還包括了組織和組織之間的評鑑。比如管中閔教授認爲，學術要進步就是要創新，而創新就是要被評鑑。要競爭，剛剛有提到就是要參與更大的community，彼此之間要競爭，因此就要有排名。爲了要有比排名，就要有「客觀標準」，而SSCI就很便利地被用來作爲一個門檻。台灣自己的重要學術資源分配單位，如國科會，也在建立自己的TSSCI。這裡面還有其他的情境可以談，整個來說，不只是SSCI借用的範圍很廣泛，有一些大學在系內的評等或薪水調整時，會將此納入考慮，所以促發我想瞭解的動機。

目前找到一些資料顯示以下幾點，第一，SSCI自稱有一個科學理性的基礎，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重要的科學概念，經常出現的只在少數的journals裡面，你只要掌握少數的journals，你就能掌握科學

的發展，大致上是如此。這可以類比爲統計上的所謂parsimonious原則，用少數的期刊，就可以知道學術發展的現況。所以建立citation index，在目的上，是科學研究者希望用來捕捉科學發展的進程，以及掌握各個學科領域裡概念的相互連結性。但是在當時1958年代，並不知道這有什麼商業利基，當時的leader叫做Eugene Garfield自己拿出五百元美金，就自己創立了ISI(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當時的資訊科技相對今天來說，其實是非常落伍的，所以不可能收集廣泛的資料，收集資料的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最早出現的是以自然數理科學爲主的SCI，社會科學的SSCI應該就是模仿SCI出現的，它是在1972年公諸於世，仍然沒有提供給一般人使用。一直到PC出現後，到1988年才開始有磁片版；等到1990年代後期，因爲網路普及，才益發顯得重要。現在ISI已經被另外一個叫做Thompson Inc的大公司買去。它是一個很大的資訊公司，在2001年所創下的收益是七十二億元美金，所以我們今天所講的SSCI，是一個大公司裡的眾多資料庫之一。其目的從一開始的科學發展邏輯，到後來已經變成是商業邏輯。

而它現在做的是什麼事呢？你可以想像現在的information科技，資料庫的成

本相對便宜，資料的搜尋使用也更簡易，無須依賴一個高度門檻來過濾，因此其資料庫必然是愈作愈大。的確如此，目前已顯示出，估計共有2000個社會科學的期刊，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章都在裡面，而百分之九十五的citations都在裡面。我甚至認爲這個數字如果接近百分之百都不是問題，剩下只是成本的問題，而成本也勢必會不斷降低。我看見社會學裡也有九十多份刊物，其實就我來講，很多我也沒有聽過，有些是新的、有些是因知識不足而沒有聽過，所以真的要在這裡出版，SSCI的選擇是愈來愈多、愈來愈擴大，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把它當成正字標記被認可，是很可議的一件事情。

其次，我們要看，它是如何進行選擇的呢？它考慮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在商言商，公司自稱會非常注意quality，但沒有說明如何注意quality的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個敏感的議題，相信一個以營利爲目的的Thompson公司，也不敢輕易公開宣稱，所謂quality是什麼，以免自暴其短。其實有些刊物，我至少可以指出一份刊物，很明顯地看出並沒有人引用。

但是資料庫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它提供了一個impact factor。簡單地說，就是一份期刊刊物內的文章，在出刊一至

兩年內平均被引用的次數，次數愈高，表示刊載這篇論文的刊物愈重要。你要去算文章的重要性亦可，但基本上，SSCI是給刊物本身的ranking，不是給研究者的ranking。給研究者的ranking，是另外一種使用的延伸。一般說來，impact factor數字愈低，表示這刊物的citation就愈無用。這組資料庫的商業契機是在哪呢？主要是圖書館、出版商。圖書館的經費有限，要買期刊必須要有選擇，所以必須看刊物的影響力。如果是出版商，它要知道學術發展的近況，最新「流行」的東西，或者正在退出「市場」的課題是哪些？當然對急於想發表的作者來說，也是一樣重要，他可以知道哪些題目是目前大家在討論的，哪些刊物的排名如何。這個資料庫讓學術市場當然更爲透明，但是不能用來替代學術品質的判准。學術品質有時候必須等候時間考驗，沈澱之後才能發現。

它有些什麼問題呢？第一個很明顯的就是英文偏見。不只有英文偏見，還有美國偏見。我們看到日本、大陸、台灣、新加坡等地基本上都沒有任何significant journals被列入。很明顯地它不適用代表東亞的學術研究。如果是中文刊物，要進入似乎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看過他們登載在網頁上的規定，基本上所有的reference寫法都要改成英文，如何

改成英文呢？這好像有點困難，但是仍然可以做。重點是，在商言商，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有什麼利益嗎？這裡有一個關於自身的例子，有一本Sage出版的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我的文章也曾經出現在裡面，journal裡的這些文章是從中文翻譯成英文的，但是impact factor根據統計是zero。首先，我們台灣人一定不會引用自己被翻譯成英文的文章，我們一定是引用自己的中文原文。而英語語系的人會覺得這只是區域研究的材料，不是「真正的」社會學。

而在亞洲，社會學聞名的刊物可說是一本都沒有列入SSCI，連日本也沒有，印度有一本，但是那是跨國公司Sage出版的，韓國則有一本Asian Women Studies。

第二，impact factor的計算受到母體影響很大，本身雖可提供一個ranking，也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蒐集偏見，我們台灣人寫的文章基本上是no impact，根本不可能被算入impact factor。因為刊物原本就不被收在裡面，所以不可能產生impact。所以台灣說要建立TSSCI，或許可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是人數少的問題，如果你扣掉self citation（期刊內的自我引用）的話，像剛剛所談的日本、印度、韓國，他們的

impact factor幾乎都是非常微薄的。因為人數少，所以會引用的都是互相有關係的一群人自己在引用。所以這裡有社群尺度的bias存在。

我們接著來看，強調SSCI，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呢？有一位國內教授曾經在網頁上主動提供在SSCI發表文章的經驗。他曾經當過是很多刊物的編輯，所以對於出版策略看得很清楚。但是他所談的學術和我們說的學術創新，是完全不一樣的。他所談的學術就是一種商品生產，就是如何蓋上SSCI的mark的知識。他在網頁上非常無私地告訴你，你要搞清楚各期刊的性質、偏好、和規格。還要搞清楚哪一些是SSCI，那一些不是，免得「投資報酬率」太低了。他很清楚的告訴大家這個「遊戲規則」的策略使用，但我不知道這跟學術有什麼特別的關係。你可以說要追求真理、新發明，但是在日常的學術practice裡面，遊戲規則是很現實的。一個助研究員、助教授要出版時，要常想到如何被認可，而認可我的人，通常是不懂得我的專業的人。這變成非常真實的學術生活裡的一個現象，如果你不把SSCI代表的含意弄清楚，你就會產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玩遊戲的作法與想法，喪失對於學術追求的誠懇與深度。

我簡單地歸納一下，本來學術進步的

潮的學術膚淺症的問題。

（這篇發言稿是經過事後修補後完成的，因此和現場記錄略有出入，特此說明。就在完成修補之時，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的TSSCI資料庫已經開放使用，預期對於以後的知識生產工作，將有很大的幫助。而在另外一方面，我繼續看到一些年輕教授在自己的工作成果的檢討上，夸夸地在談論自己在不同的SSCI出版的「成就」以及心得，得意之詞溢於言表。我很想告訴他們：請告訴我你的實質研究成績，而不是你的出版小傳，請區別學術研究者以及論文生產者的分際，請回到學術的基本。）

一個原因是透過嚴格的審查，參與國際、其他地區的publication，也是要經過嚴格的審查。但是用SSCI來作為一種正字標記的話，第一個有英文、美國的bias，既然有語言的偏見的話，其實不用說，所有文化研究的同仁都可以告訴大家，這裡同時會有文化的偏見，也有科學的偏見，就是科學理性的偏見，認為是可計算的。另外還有期刊的偏見，它只計算期刊，不計算書籍。我們也許可以花一些時間，可以舉出十本過去對你影響最重要的書籍，但是要舉出十篇過去對你影響最重要的論文，其實相對上更為困難的。

TSSCI可以解決SSCI的部分問題，如語言、文化偏見的問題，但仍會產生偏向期刊的偏見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因為它本身其實還不是一個可搜尋的資料庫，重點應該放在做知識庫的作用，而不是用來做「認可」、「排序」的作用。如果要進行排序，那麼必須使用impact factor取代現在由國科會進行的「刊物認可」工作。同時，有效的impact factor的計算，必須依賴較大的母體，以及要可能扣除self-citation的問題，所以，應該將TSSCI的門檻放低，讓更多的刊物都能夠進來，才能建立在地有效的impact factor的母體與計算。而在支持TSSCI的建立的同時，我們也應該仔細反省，那個鼓動所謂SSCI正字標記風